

东汉儒家隐士 ◆ 尹荣方

中国封建社会,隐士向为士人甚至普通民众所重,范晔《后汉书》为“逸民”作传,绝不偶然。岂止范晔,司马迁《史记》更以《伯夷传》作“列传之首”,自然也是为了赞美褒扬逸民伯夷。

隐士隐居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,不说后世将它视为“终南捷径”的假隐士、假隐居,我们从《后汉书》所传之隐士看,他们之甘心畎亩,憔悴江海,固有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的共同因素,但细细分析,隐士们归隐的出发点、旨趣、对隐居以至于对人生的价值判断都是颇有不同的。大别之,隐士主要有两类:一类的精神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道家;另一类的精神思想根子则主要是儒家的。

先看看第一类的隐士,如东汉矫慎,他是扶风茂陵人,少好黄老,隐遁山谷,住在山洞里,仰慕仙人赤松子、王乔的导引之术。矫慎与同乡马融、苏章同时,都享有大名,然马融、苏章皆自以以为不及。当时曾有人写信给他,希望他出山谋世,他不为所动,到七十余岁时,还不肯娶妻,后来突然归家,预报死日,到时间果然逝去。

矫慎无疑是饱学之士,也通儒学,故为马融、苏章所钦,然其人旨趣更在求道修仙。《后汉书·矫慎传》谓:“后人有所见慎于敦煌者,故前世之,或云神仙焉”,“矫慎被看成神仙者流,便透露了此中信息。

秦汉时代,黄老神仙之学大行,入山林隐居修行者当不在少数。但有些人之入山林不必如矫慎辈习导引术求长生,而是性情所致,受老庄思想影响,以不受束缚,见道适性为志。如有名的向子平,他“好通《老》《易》”,“隐居不仕”。据说他读《易》至《损》、《益》卦,喟然叹曰“吾已知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”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的意识,当是从道家尚柔乘刚、尚虚疾盈而来。向子平后来“遂肆志”,和他的同好朋友禽庆,游五岳名山,最后不知所终。

《庄子·刻意》曾指出具有道家思想背景的隐士即形成了两种类型:一种崇尚自然,追求无为闲适的生活境界;另一种则是导引之士,以获得长生为目标。向子平之类的隐者似乎主要还在求自然无为,内心自足,与导引求长生者不同。

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,其归隐,或非其初志,有的是为远祸避害,如逢萌,因王莽杀了他的儿子,他怕祸及自己,带领家属渡海,客居辽东,后来又隐居山东的崂山。但大多数儒家隐士之归隐,首先出于性分的因素。如太学生出身,善谈论,博通五经的丹丹,《后汉书》说他“性清高,未尝修刺候人”。

当然,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之选择隐居之路,除了性分上的不耐拘束,不慕荣利,欲寻求一种自在自由、琴书自得的生命安顿方式外(在这一点上,他们与《庄子》书中所说的“江海之士、避世之人”类似),值得指出的是,有些人恐还有因崇尚道义、气节,想以此来矫风俗的意图。这一点,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已经清楚,他指出东汉人之归

隐,“或高栖以违行,或疾物以矫情”,所谓疾物矫情,就是痛恨浇薄的世俗之情,欲起而矫正之的意思。有名的梁鸿,我觉得就是东汉时代“疾物矫情”的“逸民”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除了孔子,梁鸿最佩服心仪并引为榜样的是季札与鲁仲连。季札与鲁仲连之美,主要在于辞名位,鲁仲连之高风,还在“义不帝秦”。梁鸿之隐居,他之赞季札、鲁仲连,的确传达出他对东汉统治者不满情绪以及保持独立人格,不臣天子的心志意向。

不臣天子,不事诸侯,似乎是当时一部分儒家隐士的价值追求。他们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,坚守山林,甚至在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马欲网罗招致情况下,犹昂然不顾,不为所动。如光武帝曾亲临被范仲淹称颂为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的严子陵住处,史称严正在睡觉,竟卧不起。光武帝因抚摩他的肚皮说,“子陵,不可助我治国焉。”严子陵竟不应,过了好一会,才张开眼睛盯着光武帝说:“昔唐尧著德,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,何至相迫乎!”传说尧曾欲禅天下于巢父,巢父拒绝。严子陵虽美光武为尧,然以隐士巢父自居且以明志,光武无可奈何,叹息而去。周党也是这样,被征召,不得已,就穿着短布单衣,头上裹树皮做的绶头,来到京城。光武帝引见时,“党伏而不谒,自陈愿守所志,帝乃许焉。”皇帝召见,竟然不抬眼看皇帝。当时有大臣视周党为“骄悍”,是“大不敬”,幸亏光武帝不以为意。另一个隐士王霸微到尚书省时,“拜称名,不称臣。”有司问缘故,他引《礼记》回答:“天子有所不臣,诸侯有所不友”,终遂其志。

严子陵、周党、王霸等作为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,以不臣天子,不事诸侯来标榜自由,激励士风,他们追求精神自由,维护独立人格,品格高尚,虽不入世用世,但其作为也并不与儒家精神相悖。更不用说像梁鸿那样具有批判精神的隐士了。这些隐士的存在,对净化东汉士林的道德空气,矫扭奔竞功利的世俗之情,的确也起到一定作用。赵翼、章太炎等学者都说东汉是我国历史上士风最正,士人最讲气节的时代,这其中,未始没有隐士们的影响。后来那些积极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都推崇褒扬这样的隐士,像宋代标榜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对严子陵的称颂,主要也是着眼于这方面吧。

对于政治,儒家的理想是行仁政,东汉的儒家隐士,虽很少介入世事,但从一些隐士偶然触及政治时的言论看,他们寄望于统治者的,也就是行仁政,履行儒家的价值观念罢了。三公之一的司徒侯霸是严子陵的朋友,曾派人到严子陵处,请教一些问题。严子陵不答,拿了个信札给人,口授了下面这些话:“君房足下:位至鼎足,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,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告诫侯霸对上不可阿谀奉承,而应施行仁义之道。梁鸿之作《五噫之歌》,无疑也是因为他感到当朝天子未行仁政而发出的呐喊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

记汉阴老父(老人)事曰:

汉阴老父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中,幸竟陵,过云梦,临沔水,百姓莫不观者,有老父独耕不辍。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,使问曰:人皆来观,老父独不辍,何也?老父笑而不对。温下道百步,自与言。老父曰:“我野人耳,不达斯语。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,理而立天子邪?立天子以父天下邪,役天下以奉天子邪!昔圣王宰世,茅茨采椽,而万人以宁。今子之君,劳人自纵,逸游无忌。吾为子羞之,子何忍欲人观之乎!”温大惭。问其姓名,不告而去。

汉阴老父应该也是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,他所称颂的住茅草屋,生活简朴懂的古圣王,就是指儒家理想中的明君尧、舜。他对汉桓帝的批评比之梁鸿批评明帝还要直接尖锐。特别是他关于君主职分的思想,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,他之以此出发批评汉桓帝,也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后来黄宗羲在《原君》中所表述的观点,不就在它的范围之内么!汉阴老父对张温说“今子之君”,明白表示自己不承担桓帝为天子,不臣这样“劳人自纵,逸游无忌”的君主,在封建时代,这不能不说是振聋发聩之语。值得注意的是,作为朝廷大臣的张温的反应是“大惭”,我以为,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士风确实非后世可比,即使是朝廷中的士人,也懂得一点廉耻的。

因此,东汉儒家隐士,虽然逸处山林,但并不乏早期儒家那种明君、仁政的理想。社会现实自然难以与理想相符,所以他们往往对现实持批判态度。这与后世的陶渊明也既有静默的一面又有“金刚怒目的一面”是决无二致的。东汉的儒家隐士们在精神世界上,与孔子、孟子并没有多少差别;而与那些既怀抱儒家理想又不忘人世功名的儒者相比,则他们的这种批判精神是后者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。他们也更能保持自由的独立的人格,从而在道德上显得更纯粹、更高尚。这就是为什么所谓“出世”的他们能够受到“入世”的儒士高度赞赏向往而被极端专制的帝王疾恨的内在缘由。朱元璋曾评论严子陵,“吾观天下之罪人,罪人之大者,莫大乎严光。”他大约也看到了儒家隐士批判现实以及痛恨暴政、专制因而不臣暴虐天子、追求自由独立人格的一面。

梁鸿、严子陵之类儒家隐士的存在,对激励士风,模塑儒家精神型的人物甚至社会风气的确可以起一定作用,所以优容隐士的帝王常被看成明君的标志,范仲淹称赞严子陵时说“成光武之大”。优容隐士的确也需要胸襟与度量,光武帝的确有其“大”的一面。与光武帝相比,朱元璋显得何等小气与狭窄。光武帝懂得“人各有志”的道理,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与人格,我想,东汉时代,“士”的风气之所以比较正,与光武帝的这种大气也有一定关系吧!而朱元璋这样极端专制的帝王,对“士”的风气、对“士”的人格戕害,并进而对全民道德造成的戕害,又何可道哉!又何可道哉!

在《鲁滨孙漂流续记》(本文所引《鲁滨孙漂流续记》中译文及页码,均据黄杲炘中译本之第二部,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;唯书名以百年来约定俗成,仍沿用林纾、曾宗巩中译本)中,大约有二三万字左右(中译文),写了鲁滨孙一行在中国境内的旅行。其中提到他们在中国上岸的地方,是一个名叫“金昌”(Quin Chang)的小港口。对于这个名叫“金昌”的小港口,学者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因为事涉清朝外贸制度,本文拟对此略陈己意,以就正于通人方家。

因为鲁滨孙在孟加拉买的船被误认作海盗船,所以他不像一般的欧洲船那样去澳门,而是一路北,“越过了欧洲船只常来的所有中国港口”(其实当时欧洲船都被限制在广州贸易,但笛福却没有提到广州,反而说“欧洲船只常来的所有中国港口”,显然他并不清楚当时中国的外贸制度),去了位于“中国海岸的最北部”的“南京湾”——笛福在这里犯了一个地理常识错误,南京其实位于中国海岸的中部,而且本无所谓“南京湾”之说(现在看来,笛福所说的“广阔的南京湾”,似是指长江口一带)。这也暗示了笛福其实并未真正到过中国,对中国海域和港口缺乏足够了解(不过那时候欧洲没有到过中国,却大写特写中国的人多得是)。但因为“南京湾”里正巧有两艘荷兰船,鲁滨孙担心会落入荷兰人手里(因为怕被他们误认作海盗船),所以就改泊到了“南京湾”南一百二十六海里的小港口“金昌”(Quin Chang)。

在“金昌”,一个日本商人买下了他们所有的鸦片,又租下了他们的船。处理完了货物和船只以后,在等待四个月后的集市期间,鲁滨孙一行为分散散心,到中国内地作了两三次旅行。范存忠主张“金昌”是杭州:“至于‘金昌’,他(笛福)也没有说准,看来他要说的不是 Quin Chang,而是马可波罗游记上的 Kinsai 或 Quinsay(‘行在’)即杭州。应该说鲁滨逊是在杭州登陆的。”(《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》,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1991年,第47页)

但我认为,“金昌”并不是指杭州,而很可能是指杭州湾北侧的乍浦。不仅乍浦的地理位置较符合笛福的说法(大概位于北纬三十度左右,从“南京湾”——可能就是长江口——“往南行驶一百二十六海里左右”,“由于是逆风,我们花了五天才来到那另一个港口”——这段距离,所花时间和遭遇逆风(详见下文),正好说明鲁滨孙的船绕过了长江三角洲),而且乍浦港在清朝海外贸易中的作用,也非常接近笛福对“金昌”的描述。

据日本学者大庭脩说:“在以官商、额商为主要贸易形式的时期,即江户时代的后期,所有的商船均起航于上海或宁波。特别是1720年前后,来自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乍浦港的宁波船更是有增无减。在乍浦,有为数众多的对日商品批发行,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称其为‘日本商问屋’;唐货主的会馆——两局会馆也设在乍浦,使乍浦成为对日贸易的中心地区。”(《江户时代日中秘话》,徐

世虹译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4页) 笛福则是这样描述“金昌”的:“从澳门来传教的神父们,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进程中通常在那儿上岸,而欧洲的船只却向来不到那里……这不是一个商人活动的地方,只是在某些一定的日子,那儿有集市一类的活动,那时有日本商人去买中国商品。”(第379页)“这里通常是有集市贸易的,最近的一次集市已过去了几天,但我们看到河里还有三四艘中国帆船和两艘日本船,这两艘从日本来的船已装好了在中国采购的货物,但由于一些日本商人还在岸上,所以没有启航。”(第383页)“大概再过四个月,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又将有一次大规模集市,那时我们也许能买到这个国家的各种产

品,同时也可能找到一艘人家愿意出售的中国帆船或东京湾来的船。”(第387页) 当时中日间的海上贸易主要利用季风,即春夏利用西南季风去日本,秋冬利用东北季风来中国。一来一去之间,两地的港口都会有一段空闲时间,所以乍浦港也应有“忙季”(集市)和“淡季”。从时间上来推算,鲁滨孙到乍浦港应是1702年7、8月(西历)之交(所以从“南京湾”南下时遭遇了逆风,因为那时还在刮西南季风),那时候正值“忙季”刚刚过去,即大批商船已从乍浦港起航赴日本,要等四个月后的下一个“忙季”,也就是东北季风刮起后的一段时间,才会有大批来自日本的商船和大量货物云集乍浦港。小说里还写道,在鲁滨孙于1703年2月(西历)初从北京出发之前,“我的合伙人和老领航匆匆去了我们当初抵达的港口,为的是处理我们留在那里的一些货物”(第393-394页),那时应正逢乍浦港进入“忙季”(距鲁滨孙登陆“金昌”也正好约有四个月),他们很容易出脱留在那里的货物。可见乍浦很符合笛福笔下的“金昌”。而鲁滨孙到达那儿的1702年,笛福出版此小说的1719年,也正是大庭脩所说的“1720年前后”。所以,“金昌”很有可能即指乍浦,而不太可能指杭州——当时的杭州并非外贸港口,也并不开展对日本的贸易。

至于发音上的截然不同,笛福自己其实也有个解释:“他所说的那个港口名称,我也许拼音有误,因为我没有特别用心记住其发音,而我记下这地名和许多其他地名的笔记本又因碰上意外,着了水之后就全完了……但是有一点我是记得清楚的,就是在同我们打交道的中国或日本商人嘴里,这地名同那葡萄牙人领航员说的不同,他们对这地名的发音就是上述的金昌。”(第379页) 这里鲁滨孙的表述稍微有些混乱:既然“金昌”这个发音是葡萄牙人领航告诉他的,而中国和日本商人嘴里的发音与彼不同,那么又怎么可能“他们对这地名的发音就是上述的金昌”呢?但不管怎么说,这里的混乱本身就告诉我们,对于“金昌”这个发音我们不必太当真——笛福根本就不懂中文,也从来没见过中国! 而这个既不懂中文、也没来过中国的笛福,怎么就会阴差阳错地写到了乍浦港——这个对日贸易的专用港,欧洲船在不涉足的地方,则只有问他本人才能知道了。曾替政府做过“间谍”的他,肯定有自己的“情报”来源——只要看整个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《鲁滨孙漂流续记》,栩栩如生地写的都是他从没经历过的事情,就可以知道他搜集处理“情报”的能力如何了得了。

鲁滨孙登陆“金昌”的一百四十年后,或笛福出版此小说的一百二十余年后,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,1842年5月17日,英军攻陷乍浦,纵兵烧杀掳掠,史称“乍浦之变”。这是后话了。此事与笛福写到“金昌”有无关系?姑留待“反间谍”侦探们去探究吧!

『金昌』在哪里 ◆ 胡言



丹尼尔·笛福(Daniel Defoe 1660-1731)